

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及可持续性研究

——兼对《美国贸易逆差研究》的评述

沈国兵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433)

摘要:著作《美国贸易逆差研究》从美国贸易差额演进及贸易逆差结构因素、支撑因素、政策因素等方面揭示出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并基于全球价值链、产品内分工、美元化等方面,揭示出美国贸易逆差与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国际竞争力、贸易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而剖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同时,结合全球产业转移、美元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演进关系,全面分析了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探究了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成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和调整思路。

关键词:美国贸易逆差;经济增长;国际分工;成因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6-0105-06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6.013

The Causes of US Trade Deficit and Its Sustainability: A Commentary on *The Study of US Trade Deficit*
SHEN Guo-bing

(Institute of the World Econom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US Trade Deficit* reveals the causes of US trade deficit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the US trade balance evolution, and the structural, supportive and policy factors of US trade deficit. It based o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tra-product division of labor, dollarization and so on,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trade deficit and the inflation rate, employment rat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trade interests, further exploring their macro and micro basis of US huge trade deficit having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Meanwhile, combined with the evolution relationship among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dollarization, virtu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 trade deficit, probes into the cost of adjusting US trade deficit, and on this basis puts forward an idea of adjusting its objectives and thinking.

Key words: US trade deficit;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s; causes

一、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贸易逆差逐步演变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种常态。无论是从总量还是相对量来看,美国贸易逆差均呈

现出整体扩大态势。2006 年,美国贸易逆差高达 7 635.3 亿美元,2007—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贸易逆差有所降低,2013 年又开始呈上升态势,2018 年美国整体贸易逆差上升至 6 210.0 亿美元。有关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影

响与可持续性等问题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课题,并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次贷危机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美国政府为摆脱危机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与出口倍增计划,进一步使得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自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美双边贸易额快速增长,由 2001 年 805.0 亿美元增加至 2017 年的 6 359.7 亿美元。随着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中美双边贸易失衡也在扩大。按美方统计,美中贸易逆差从 2001 年 830.5 亿美元增加至 2018 年的 4 192.0 亿美元。2019 年,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中美双边贸易额下降,但美方统计的中方逆差仍高达 3 456.0 亿美元。这也成为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借口。由此,探究美国贸易逆差或美中贸易逆差的成因及其在相关方面的影响对中美经贸关系及我国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长沙理工大学刘建江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聚焦此存在争议的热点问题,完成了著作《美国贸易逆差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17 年 3 月出版,这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JL010)的最终成果。该著作依据国际收支理论、国际分工理论、产业转移理论、跨期贸易理论等,运用比较分析、计量经验分析等方法,围绕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影响与可持续性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深入研究。以下将对《美国贸易逆差研究》一书作出扼要评述。

二、美国贸易逆差成因的综合性分析

该著作阐释、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及规模。

从历史维度来看,美国贸易逆差并非与生俱有。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才开始结束其长期的贸易顺差局面,20 世纪 80 年代中早期,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并直接导致了美日贸易战以及催生的广场协议,进而将美国贸易逆差逐

步演变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因此,对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的研究被学者们纳入到全球经济失衡的整体分析框架当中^[1-2]。

著作《美国贸易逆差研究》描述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贸易差额呈现的货物贸易逆差与服务贸易顺差的并行状态,且发现其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主要集中在最终消费品与石油及其制品为代表的资源性产品贸易逆差上^[3],这也是长期以来美国贸易逆差调整极其艰难的重要原因。该著作表明,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地自 2003 年开始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趋势,中国在美国逆差中所占比重不断攀升,使得美国愈发对逆差较大的单一国家采取较为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这也为 2018 年 3 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埋下了伏笔。不过,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或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究其原因,美国贸易逆差具有巨额性、全球性、持久性,其根源在于美国经济内部。

Mann 等学者罗列了影响美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金融体系、储蓄—投资缺口、宏观经济政策、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等^[4]。大量学者对此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如余永定^[5]、陈继勇与刘威^[6]、陈继勇与杨格^[7]、姚枝仲^[8]、夏先良^[9]等。

实际上,这些影响因素是在国际收支理论分析框架中来演绎的,这也是分析美国贸易逆差成因及影响的理论依据。不过,单一理论难以完美诠释美国贸易逆差,比如国际收支理论中的货币论和吸收论从总需求变化角度分析国际收支失衡及调节问题,却忽视了经济供给层面对国际收支的作用。与其相近的是将美国贸易失衡归为其内部存在巨大的储蓄—投资缺口,即美国投资率大于储蓄率,进而造成经常账户失衡。伯兰克认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根本原因在国外^[10],美国消费率高、中国储蓄率高,由此形成中美之间的巨大贸易差额^[11]。杰

克逊也认为,储蓄与投资失衡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12]。国际收支理论中的弹性分析法,强调的是汇率变动如何影响国际市场进出口需求弹性。然而,汇率问题是否影响了美国贸易逆差这一问题,两派观点一直在交锋,至今也没有定论。Bergsten等学者认为,美国大量贸易逆差是由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操纵货币汇率产生的^[13]。但是,沈国兵、孙浦阳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汇率调整并不能有效改善美国贸易逆差^[14-15]。麦金农也指出,通过美元贬值来降低贸易逆差既无必要,也非市场所乐见,事实上还难以实现^[16]。

刘建江等学者探讨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并在著作中基于系统论视角全面剖析了美国贸易逆差的综合性成因,通过归纳各种因素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按照主次、供求、长期与短期、内因与外因等角度,将其归为三大类^[17-18]。第一类是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包括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开启的国际产业转移因素,其伴生国际直接投资因素、产品内分工与国际生产组织安排所形成的新国际分工态势。这种结构性因素是美国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源。第二类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支撑性因素,包括作为国际媒介货币和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元、储蓄—投资缺口、财政赤字、金融发展差异、人口结构变化等,由此解释了为何美国贸易逆差如此之大的原因。第三类是政策性因素或辅助性因素,包括汇率、重商主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统计方法差异等。

相较于沈国兵^[19-20]、余永定与覃东海^[21]、马先仙^[22]等学者的研究,上述分析综合归纳得更好,让人对美国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源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丁剑平等学者指出,美国对外贸易中存在“潜在的反比较优势现象”,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不在于外部收入、汇率等外部因素,而在于其自身,美国进出口贸易结构、贸易惯性和潜在的贸易政策才是美国贸易逆差形成和恶化的原因^[23]。马国旺基于现代

货币理论的视角,认为美元的主权货币和超主权货币的双重角色助推美国财政赤字,这成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根源,在美国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和国债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货币金融性的“寄生”关系^[24]。沈国兵认为,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的美元流动性是全球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驱动力,而贸易逆差是美元作为国际信用本位货币且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国别消费市场的必然结果^[25]。

三、美国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长期共存的原因

对美国贸易逆差进行深入研究,需要阐释的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性。

一方面,该著作系统分析了美国贸易逆差对宏观经济体系的影响。Obstfeld和Rogoff用跨期替代理论来分析美国经常账户逆差,认为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的隐患^[26]。全球贸易失衡不可持续论者认为,贸易失衡是制约国家经济稳定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因素,既不利于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27]。实际上,刘建江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已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多年来美国经济体系的长期运行与巨额贸易逆差共生的原因^[28-30]。从宏观层面来看,贸易逆差大幅度推动了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并为美国服务业、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大量商品进口也逐步弥补了美国国内供给缺口,保持了美国在增长中的低通胀水平。由此,美国贸易逆差并没有阻碍美国经济增长,也不是美国高失业率的根源,因而美国贸易差额与失业率、经济增长的联系日益淡化,贸易逆差得以长期存在^[31]。

另一方面,该著作进一步分析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体系共存的长期微观基础。在一些相关研究中,Hickok和Hung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持续贸易逆差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认为美国贸易逆差对美国产业竞争力不

利^[32]。Blecker 也认为,持续的贸易逆差体现了美国各产业的竞争力不足,不再具有技术优势^[33]。但是,也有文献表明贸易逆差并不影响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贸易逆差持续存在体现了美国经济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大^[34]。Porter 的研究表明,一国经济得以发展的关键是其产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先进的创新机制和创造能力,与贸易状况无直接关系^[35]。而刘建江等学者认为,在产品内分工态势下,美国跨国公司聚焦于全球价值链两端,把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向外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市场,由此使得贸易差额的传统状态与传统贸易利益的分享机制发生改变,传统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内涵也出现了新变化^[36]。由此,商品贸易逆差并不一定是一个经济体贸易利益的逆差,也不反映该国商品竞争力的下降。事实上,贸易利益大小才是决定贸易与经济增长、贸易是否最终影响失业、贸易与国际竞争力关系的核心因素。长期以来,中国和美国互为名义上的巨大顺差国和逆差国,但是贸易差额只是表象,仅仅是最终产品进出口关系的体现,深层次的利益分配存在于全球价值链之内,贸易差额与商品竞争力、贸易利益逐步脱节。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一国贸易差额与失业率、经济增长的联系逐步淡化,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长期存在也就具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认同此观点,如张志明与杜明威^[37]。

四、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调整思路

从经济理论来看,美国贸易逆差被认为难以持续,调整在所难免。这也是该著作中要解答的第三个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美国长期稳定的增长与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淡化了人们对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担忧,但是次贷危机爆发凸显了美国经济体系存在的风险,尤其是使得美元体系面临巨大隐患^[38-40]。该著作

表明,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弥补了美国商品缺口,确实减少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也导致整个市场逐步失去对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约束,资产价格则成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放松金融管制与金融创新相互推进,以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来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于是,美元流动性泛滥,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使虚拟型经济增长成为一种趋势,在助长贸易逆差的同时,最终影响到美元信心,使得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面临可持续性难题。当市场达到一个临界点时,美国金融危机就会爆发。由此出发,该著作作为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提供了一个“贸易—金融”关系视角。

刘建江教授历时数年完成其力作《美国贸易逆差研究》,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研究表明,金融危机爆发直接反映出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面临着巨大挑战。美国经济失衡意味着全球经济失衡,将会危及到世界经济体系的健康稳定运行。该著作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并非旨在消除存在的贸易逆差,而是要在深入权衡贸易逆差调整成本的基础上,达到一个全球经济系统可以承受的调整目标区间。美国经济失衡事实上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表现,美国贸易逆差调整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在当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需要维持美国适度的贸易逆差规模。从长远来看,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需要美国逐步改变其债务型、虚拟型和服务型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减少财政赤字,逐步改变居民消费习惯与消费方式,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增加出口等。从全球来看,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功调整还依赖于欧盟、东亚、东盟等地区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改变,尤其是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顺利进行。

2017 年,美国与世界上 102 个国家同时存在贸易逆差。由此,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是一个涉及全球经贸关系的庞大系统工程,各国调整与不调整的成本与收益、美国贸易逆差的具体调整目标,仍需要明确的衡量方法。未来,中

美两国国家战略的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如何影响到两国贸易平衡,以及世界大国博弈背景下工业 4.0、新工业革命对两国贸易平衡的影响等方面,仍然有待进行深入探讨。

五、结语

21 世纪初开始,刘建江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发表了约 20 篇有关美国贸易方面的论文,其代表性成果分别发表在《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国际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世界经济研究》等期刊上。其团队成员洪联英教授在《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了相关论文 6 篇,成为该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成就了《美国贸易逆差研究》这一学术专著,也是刘建江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对美国贸易失衡问题长期追踪研究的系统性总结,体现了该研究团队在美国贸易失衡问题研究方面的成果特色。刘建江教授团队也较早研究了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之间的关系,在该著作基础上进行的后续研究课题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17JZD022),获得了 2017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间接反映了学界对该团队研究成果的认可。

著作《美国贸易逆差研究》具有如下学术价值:一是梳理了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多种因素,并进行合并归类,避开立场的偏颇,分三个递进层次探究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进而能够更好地把握美国贸易逆差的演变趋势,并为分析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提供了一个基于系统论视角的综合性分析。二是将产业转移、产品内分工、全球价值链与“金融—制造”国际分工等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美国贸易逆差成因的结构分析,厘清了多个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将生产领域的分工与金融领域的分工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二者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产业分工体系的层

次性、协同性和生态性。三是以产品内分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探究了贸易差额中的贸易利益所得及流向问题,指出了当前美国官方公布的名义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失业率、商品竞争力脱节的根源,同时也揭示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微观基础。由此,提出了名义顺差(逆差)与福利顺差(逆差)的概念,可为当前分析贸易逆差与宏观经济体系的关系提供新思路。四是探究了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成本、目标区间等思路,并从各国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视角探究了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和调整问题,深化了跨期贸易理论在美国贸易失衡问题中的应用研究。

总体上,该著作作为我们准确把握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提供了一个贸易视角的经验分析证据,有助于全面认识全球经济失衡中的美国、中国等大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 2018 年以来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等。该著作聚焦美国贸易逆差或经常性失衡问题,将该领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政府、商会和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及可持续性,提供了一本很好的诠释力作。

〔参考文献〕

- [1] Ronald McKinnon. The U. S. Saving Deficiency, Current-Account Deficits, and Industrial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China[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3, 35(3): 449-458.
- [2] 王栋贵. 全球经济失衡原因论争综述——被忽视的基于美国视角的解释[J]. 经济评论, 2013(1): 152-160.
- [3] 刘建江. 美国贸易逆差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208-250.
- [4] Mann C, Pluck K. The US Trade Deficit: A Disaggregated Perspective[J]. Working Paper, 2005: 5-11.
- [5] 余永定. 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J]. 国际经济评论, 2010(3): 7-44, 3.
- [6] 陈继勇, 刘威. 美中贸易的“外资引致逆差”问题研究[J]. 世界经济, 2006(9): 42-48, 96.
- [7] 陈继勇, 杨格. 中美货物贸易巨额逆差的真实原因[J].

- 江汉论坛,2019(1):15-21.
- [8] 姚枝仲. 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调整及其影响[J]. 国际经济评论,2006(2):34-38.
- [9] 夏先良. 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10] Bernanke B. Global Imbala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R]. Bundesbank Lecture, Berlin, Germany, 2007.
- [11] 李稻葵,李丹宁. 中美贸易顺差:根本原因在哪里? [J]. 国际经济评论,2006(5):13-16.
- [12] [美]詹姆斯·杰克逊.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美国贸易逆差[J]. 王宇,译. 金融发展研究,2018(9):54-57.
- [13] Bergsten C F, Gagnon J E. Currency Manipulation, the US Economy,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Order[R].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2012.
- [14] 沈国兵. 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 [15] 孙浦阳,靳舒晶,卞超. 汇率调整是否能有效的改变贸易逆差呢? ——从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差异性的角度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2011(6):25-33.
- [16] [美]罗纳德·麦金农. 美元大幅度波动既无必要也非人们乐见[N]. 嘉虹,译. 上海证券报,2006-12-18.
- [17] 刘建江,袁冬梅,王国杰. 巨额贸易逆差与美国经济增长并存:美元因素及其隐忧[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107-111.
- [18] 王耀中,洪联英,刘建江. 企业所有权、贸易组织结构与中美贸易失衡——基于两国经济一体化均衡模型的分析[J]. 经济学,2010(1):125-148.
- [19] 沈国兵. 显性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与中美双边贸易平衡[J]. 管理世界,2007(2):5-16.
- [20] 沈国兵. 美元弱勢调整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5(4):77-91.
- [21] 余永定,覃东海. 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J]. 世界经济,2006(3):31-41.
- [22] 马先仙.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研究:基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视角[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 [23] 丁剑平,刘璐,张冲. 美国贸易逆差形成中的“潜在的反比较优势现象”——对“汇率操纵逆差说”的反驳[J]. 财经研究,2019(11):83-96.
- [24] 马国旺. 从现代货币理论看美国贸易逆差的本质和成因[J]. 学术研究,2020(2):102-109.
- [25] 沈国兵. 国际金融(第三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01.
- [26] Obstfeld M, Rogoff K. The Intertemporal Approach to the Current Account[C]. NBER Working Paper, 1994: 48-93.
- [27] Obstfeld M. Financial Flows, Financial Crises, and Global Imbalanc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2(3):469-480.
- [28] 刘建江. 是盈余还是赤字: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探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02(6):32-35.
- [29] 刘建江. 透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并存的合理性[J]. 国际贸易问题, 2005(7):35-40.
- [30] 刘建江,袁冬梅. 贸易逆差是否削弱了一国国际竞争力:美国经验[J]. 国际贸易问题, 2008(12):3-9.
- [31] 袁冬梅,刘建江. 论巨额贸易逆差与美国经济增长的依存关系[J]. 国际问题研究,2007(4):55-60,67.
- [32] Hickok S, Hung J. Explaining the Persistence of the U. S. Trade Deficit in the Late 1980s[J]. Quarterly Review, 1991(16):29-46.
- [33] Blecker R A. Structural Roots of U. S. Trade Problems: Income Elasticities, Secular Trends, and Hysteresis [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992, 14(3):321-346.
- [34] Krugman P R. Technology, Trade and Factor Pric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50(1): 51-71.
- [35] Porter M.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6):77-90.
- [36] 刘建江,杨细珍.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中的贸易利益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2011(8):68-80.
- [37] 张志明,杜明威.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摩擦的非对称贸易效应——基于 MRIO 模型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12):22-39.
- [38] 刘建江,蒋丽霞,唐志良. 美元霸权基础的动摇与美国应对战略探析[J]. 国际展望,2016(3):107-125.
- [39] 洪联英,刘建江. 中国为什么难以转变外贸发展模式——一个微观生产组织控制视角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12):3-19.
- [40] 葛明,赵素萍,林玲. 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分配格局解构——基于 GVC 分解的视角[J]. 世界经济研究,2016(2):46-57.